

抗战史学与民族精神

——作为抗战文化的史学及其历史贡献

田 亮

内容提要 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受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强烈影响,在培育国民的民族意识、弘扬民族抗战精神等方面为民族抗战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尽管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抗战史学依然取得很高的学术成就;当然由于治史目的存在一定的偏颇,其局限性也无庸讳言。

关键词 民族主义 抗战时期 史学思想 民族精神

关于抗战文化的研究,多年来以文学戏剧界的抗战活动成果最为宏富。史学界的抗战活动同样波澜壮阔,其人其事其文令人荡气回肠。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抗战时期的史学视之为学术成就有限的“战时史学”而有意避而不谈,即使提及,也是将其视为中国史学走向学科化进程中的一段弯路,一个过度纠缠于现实而妨碍学术正常发展的反面教训。^① 本文对作

① 80年代前后兴起的“回到乾嘉去”的考据风及以后声势日盛的实证主义史学思潮,是对经世史学乃至“影射史学”的反动。王学典是“战时史学”概念的较早提出者,但他对“战时史学”的评价尚属公允。参见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收入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对抗战史学的正面评价,主要有蒋俊:《抗日战争与爱国主义史学》,《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田亮:《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陈其泰:《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陈其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的思考》,《浙江学刊》1999年第1期。

为一种抗战文化的“抗战史学”进行了初步的考察,着重分析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特殊群体的史学家们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历史功绩。

一 民族主义:抗战史学的灵魂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演变,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说“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一百年历史的思想主题,那么历史学的发展演变则是这一思想主题最集中的体现。20世纪初,梁启超首倡史学革命,构建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新史学”体系。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俨然要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刀两断,标志着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民族主义发生根本性转向。在史学领域,“新史学”向纵深发展,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科学派史学成为史学主流,它以另一种取向表达他们同样强烈的民族主义主张。

进入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的步步入侵,中国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激发起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在爱国主义思潮的激荡之下,中国史学的经世传统,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的爱国主义传统又得到了空前的高扬。爱国主义在各派别史学家及其著述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近代以来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层次的爱国主义内容在抗战时期的史学中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抗战史学一时显得丰富而又简单。

说它丰富,是因为它既有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世界大同为终极目标,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有要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政治民主,同时又惧怕人民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史学;同样是以民族主义相号召,既有抵制外来文化侵入,主张保存“国粹”的文

化保守主义史学,也有以世界民族竞争之亟为着眼点而致力于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阴暗面,主张举国体制的“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

说它简单,是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史学,无一例外地主张对日作战,反对妥协投降,表现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空前的团结。甚至一向标榜“求真”乃治史唯一目的的实证主义史学,也不愿坐视旁观,起而从事反文化侵略的史学研究和著述。正是这种多种学派的并存,使抗战史学充满了矛盾和斗争,而在主张抗战反对投降问题上的高度一致,又使各派史学形成一种团结的局面。抗战史学就是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一种既一致又有分歧,既合作又斗争的动态平衡。

爱国主义史学随抗战形势的发展而不断的演变着,一旦民族危机缓解,各派之间的固有的矛盾和分歧凸显出来,先前的团结局面难以维持,爱国主义史学阵线也便宣告解体。

从治史旨趣上看,“致用”追求压倒了“求真”精神。

史学研究的本质是求真,研究的过程也就是求真的过程;“致用”不是预设的标的,而是求真以后才能附丽其上的价值。抗战时期,各派史家几乎都怀着报国赴难的民族大义和社会良知,试图为民族抗战从史学角度贡献一己之力。通史以致用,成了史学家们普遍的学术倾向。文化形态史观派的史学家雷海宗曾提出所谓中国文化“两周”论为抗战服务,他认为,其他文化仅一度兴亡,唯有中国文化在走完第一周以后还能创造第二周;抗日战争的成败将决定中国文化能否顺利开创出第三周;而确保抗战胜利的关键就是国家至上,措施之一就是建立一种由前任指定的非世袭的元首继承制。^①

① 见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 1940 年版。

素以考据著称的陈垣,抗战时期的治史旨趣却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①陈垣还在《通鉴胡注表微·边事篇》里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从“专重考证”到“趋重实用”,“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体现了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生死关头,以民族抗战事业为重的思想境界。

因抗战而暂时改变治史宗旨,最典型者莫过于傅斯年。众所周知,掌门史语所的傅斯年最重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抱着任何“致用”目的去研究历史,屏弃一切可能带有主观性的动机。他声称“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我东北河山,傅斯年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鼓吹抗日救亡。1932年,他打破“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写成《东北史纲》第1卷,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理论,驳斥日本侵略者“满蒙非中国领土”的谬论,证明东北本来就是我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片土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无独有偶,实证主义史学的重镇之一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将研究的重心由“中期的上古史”转向中国边疆史和民族史,他说:“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但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所学必求致用”,因为“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不容更有浪费,故

① 陈垣:《致方豪》(1943年),《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2页。

②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6页。

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①

从内容上看,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史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抉发。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阐发优秀的民族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不仅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也是建设民族新文化的需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壮大,也经过了漫长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历史上,既有各民族友好相处共同发展时期,也有民族间矛盾和斗争激化紧张时期。为了抗击异族入侵,反抗民族压迫,各民族都涌现出一些自己的民族英雄,当然,出卖民族利益、甘心投靠敌人的民族败类也不乏其人。另外,在历代政权更替的王朝战争中,也涌现出无数忠贞不渝、敢战敢死的忠臣义士,这些故事代代相传,融入彻骨浃髓的民族文化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即:面对暴力的威胁和富贵的诱惑,能坚守气节者受到尊崇,并将流芳百世;反之,那些出卖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变节投降分子,甚至为虎作伥残害同胞的无耻之徒,则遭到鄙视,以至遗臭万年。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在国家无事社会安定时期往往隐而不彰,但每当国家、民族遭遇外患之际,就将发挥其巨大的威力,闪耀出灿烂的光辉,激励着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为之冲锋陷阵,赴汤蹈火而不辞。在全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伟大战争中,借助历史学家的精彩描绘以及创造性的诠释,中华民族这些优良的传统便得到了空前的发扬光大。

首先,表现为弘扬民族气节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大量出现,历代

^① 顾颉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计划书》,当时未公开发表,《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的节烈之士的事迹受到极大的关注。据笔者观察,见之于抗战时期各主要报章杂志的有关屈原的论文最多,汉代通西域、灭匈奴以雪国耻的张骞、班超,滞留匈奴19年而不辱节的苏武,常常受到热情的赞颂。两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的时期,可谓良莠毕现,忠奸分明,岳飞、宗泽、李纲、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爱国忠君之举得到了褒扬,有关岳飞、文天祥的气节故事不断被演绎,屡屡见之于报章杂志;相反,充当汉奸出任伪职的张邦昌、刘豫,对敌妥协残害抗战将领的秦桧、贾似道之流,则受到无情的鞭挞。边患严重的明朝,前有鞑靼于北疆的扰边,中有倭寇东南沿海的劫掠,后有满清大举入关,先后出现了击退瓦剌的民族英雄于谦,抗倭名将俞大猷、戚继光,抗清名将史可法等,有关他们的论文论著这一时期也明显增多。可以说,战时人物传记以及史学评论都把是否坚守节操奉为“古今之通义”,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历史人物,如同春秋笔法,寓今人的褒贬于历史评价之中,将传统史学的劝戒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其次,体现在国史的编著上。一国历史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历史学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道德伦理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家族的延续都有着极重要的关系,爱国主义、民族自尊心、道德规范、人们的品德情操气节,都是靠史学研究和著述而来。章太炎曾直言,提倡民族主义必须讲求史学,民族主义之与史学如同庄稼与水分。朱希祖也相信“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认为中国“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政府应该开馆修史,“藉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① 国史大师柳诒徵更言之凿凿:要讲民族主义,发扬爱国主

^① 引自傅振伦:《朱希祖传略》,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9页。

义精神,惟有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在他看来,鼓励民族精神,不能只讲岳飞、史可法的悲壮故事,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衰弱的时代,多讲“不免使人丧气”,而应该大讲中国最强盛的时期如汉唐,就是说,“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存亡危急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溃势”。^①这一时期的吕思勉虽未曾改变自己的长期研究计划,也在著史、讲史中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主的。他之所以撰著国史,就是“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②在书中,吕思勉表达了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和对抗击异族侵略的民族志士的无限景仰,并直抒抗战必胜的乐观情怀。缪凤林则继承了20世纪初国粹主义史学思想,认为:“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③钱穆更强调国人应对国史以及民族文化应怀有“温情与敬意”,认为国史的任务即在于“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已尽之责任,而油然而兴起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④

总之,一切有爱国心的史学家们,无不“强调历史的教育功用,企图以祖国的光荣事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家都极为重视国史的研究和著述,先后出现

① 柳诒徵:《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期。

②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③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后改题为《中国通史要略》,内容基本未变),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25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⑤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1941年。

了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泽的《中国历史简编》，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一大批通史著作。断代史和专门史也大量涌现，而对历史上民族矛盾激化时期历史人物事件的研究和著述则不计其数，蔚为大观。

其二，边疆史地研究热潮的兴起。

中国近代以来几度掀起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都发生在民族危机比较严重的历史时期。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边疆，一些爱国的学者为救亡图存，纷纷从事边疆地区历史、民族、文化、地理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西北、西南都有帝国主义觊觎。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觉察到边疆危机的深重，于是倡导起边疆史地的研究，为开发边疆保卫边疆服务，并藉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诚。他们成立学会，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开展对边疆的调查研究，从而掀起了边疆史地研究的新高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顾颉刚等发起的禹贡学会及其《禹贡》半月刊。他们认为，在“强邻狂施压迫、民族主义正在酝酿激发的时候”，来“考察本国的民族史和疆域史”，为弘扬民族精神服务，这是知识阶层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所应尽的责任。此外，先后出现的中国边疆学会、边政学会、新亚细亚学会、中国社会调查学会、东方学会、开发西北学会、东南大学史地研究会等也较有影响。他们出版了众多刊物，诸如《边政公论》、《边政导报》、《边事研究》、《边疆研究论丛》、《边疆研究季刊》、《康导月刊》、《国闻周报》、《新亚细亚》、《中国边疆》等，对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保土热情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其三，对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日本问题的高度关注。

近代以来，列强对我国之侵略不遗余力，使我在中外交涉中不断丧权失地，一步步走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对此，凡有血性的

中国人无不悲愤难已,因而“帝国主义侵华史”、“国耻史”的编著层出不穷,目的不外乎警醒国人,莫忘国耻,自强不息,励精图治,以使我民族国家早日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0世纪以前,侵略中国的除了沙皇俄国外,主要是西方列强,因此,它们便成为中国民族主义者抨击的主要靶子。而日本作为一个东亚国家,有着深远的中国文化渊源,近代也受辱于西方列强,直到19世纪后半叶实行明治维新,效法西方,改良弊政,才逐步富强起来,摆脱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所以许多爱国人士包括孙中山,起初对日本并无警惕,甚至把它当作和中国是“同文同种”的可靠盟友看待。但事实上,日本借助于内外诸条件迅速崛起以后,却很快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把目标指向它的老师——中国。到了20世纪初尤其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后,国人已普遍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敌人。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吞了中国东北,又进而觊觎华北以至把整个中国作为它的殖民地,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从此,中国学者更加重视中日关系史和日本问题研究,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40年代,国内共出版了日本侵略中国史专著达13部,国耻史5部,日本历史著译数部,有关论文不计其数。

在抗日救亡的浪潮中,全国的日本研究杂志也日益普及和深入。那些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针对性、目的性更强,开始了全面、深入的对日研究。30年代初出现的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团体,如上海日本问题研究所、南京日本研究会等等,聚集了一批研究学者和留日归国学人,出版了大量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杂志。李书成在《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一文中称,1930年至1946年关于日本研究的全国性杂志一下子增加到13家。如《日本》《日本研究》、《日本评论三日刊》、《日本评论》、《中日评论》、《中日论坛》、《日文与日语》、《日本论坛》等杂志,在上海、南京、广州、北平、

重庆、哈尔滨等城市相继出版。这些杂志针对性强,价格便宜,具有很大的群众性、普及性,使得日本研究“从少数人写少数人看,变成大家写大家看”,推动了日本研究的普及和深入。^①而据林昶的统计,20世纪30~40年代我国主要的日本研究杂志至少有28种之多。^②

史家空前注重日本历史、现状的译介和研究,一方面固然是爱国学者的民族自觉,另一方面也是现实的迫切要求。随着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到最后公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迫切要求对敌国有更多了解。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家恰恰适应了现实的要求,体现了其关注国运盛衰的优良传统。

其四,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反击。

帝国主义者为了达到侵略中国,奴役中国的罪恶目的,不仅从军事上进攻,经济上掠夺,还企图从文化上、民族心理上征服中国人民。他们肆意歪曲中国历史和文化,鼓噪什么中国文化“外铄论”,中国社会“停滞论”,中华民族“西来”说、“东来”说等谬说,千方百计为其侵略中国制造理论根据,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敌意志。

所谓“中国社会长期停滞论”,最早由18世纪70年代英国手工业时代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陶希圣首先提出这一问题,从而引起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陶希圣提出“士大夫社会”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陈伯达提出“特殊亚细亚形态”造成“中国社会停滞”;王礼锡则提出,由于地理环境使中国无意于海外殖民,又几度经过“低级文化民族的侵入”,

① 李书成:《中国的日本学研究》,《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林昶:《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研究杂志述论》,《中日关系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将商业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文明踏得粉碎。王礼锡相信,如果没有外力的阻碍,中国历史上的“商业资本主义是能按照历史的规律自动的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此外还有一些人从历史事象中寻找“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各种观点见仁见智,其中不乏带着某种政治目的的主张,但总体看来仍属于学术领域的探讨。^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这一问题之重新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则明显带有反对文化侵略的色彩。1937年到1938年,日本法西斯代言人秋泽修二为配合日本侵略中国,先后抛出了《东洋哲学史》和《支那社会构成》两部书,肆意歪曲马克思关于亚洲社会的论述,反复宣讲所谓“中国社会之(亚细亚)的停滞性”,鼓吹“此次中日事变……皇军的武力”将“给予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以最后的克服”,使“农业的中国……与工业的日本结合”,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舆论。显然,“停滞论”不再是单纯的学术观点,而成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理论根据”。

面对侵略者在文化上的猖狂进攻,中国进步史家出于爱国的义愤和科学的治学态度,纷纷撰文予以反击。吕振羽连续写了《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李达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吴泽发表了《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吗?》,华岗发表了《评侵略主义的中国历史观》,蒙达坦、罗克汀、王亚南等一批史家也起而著文驳斥秋泽修二的观点,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清算秋泽修二侵略理论为内容的文化批判运动。这场批判运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力地驳斥了法西斯御用文人的假学术招牌的侵略主义谬论,挫败了侵略者从文化上征服中国的险恶企图,极大地鼓舞艰苦抗战中的中国军民。

① 参见何干之:《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中国文化(或人种、民族)起源问题,是在近世东西交通之后,一些热心于中国古史的西方学者首先提出来的。17 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基督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并著书撰文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自此,“欧洲人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①可见,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从一开始作为问题提出时就带着强烈的文化侵略和反侵略色彩。对此,中国学者盲目信从者有之,推波助澜者有之,以民族义愤起而辩驳者有之。刘师培、黄节、章太炎、蒋智由、丁谦等近代学者都曾误信并传播过中国民族西来之说。^②进入 20 世纪,随着东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步步加深,随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认识到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危害,它很容易被帝国主义者用作侵略中国分裂中国的口实。从理论上讲,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是由中亚传入而非东亚本土所创。这就无异于宣称,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缺乏创造文化的能力,连中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古代灿烂文明都非本土所创,而由所谓外邦输入,是“外铄”的了,这自然会极大地伤害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对此,一些敏感的民族主义史学家开始关注于这一带着鲜明政治色彩的学术命题。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伴之以法西斯御用文人的侵华鼓噪,清算东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的种种谬论成为中国历史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战前,有何炳松、金兆梓^③等就这一问题发表论辩文章,随后

① 何炳松:《中华民族起源之新神话》,《东方杂志》第 26 卷第 2 号,1929 年 1 月。

② 参见吴泽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有关章节,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③ 金兆梓:《中国人种及文化之由来》,《东方杂志》第 26 卷第 24 号,1929 年 12 月。

是民族史家缪凤林^①、马克思主义史家尹达^②、吴泽^③也先后运用最新的田野考古成果,以古人类学、古地质学为武器,批驳了东西方学者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各种奇谈怪论,以无可置疑的文献论证了中国人种和文化是本源的,不是外来的,从而有力反击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民族自信心。

要而言之,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是中国历史学界最强劲的思潮。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抗战派则从历史的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事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④这是战时中国历史学的主要趋向。^⑤

二 抗战史学的历史贡献

抗战史学的历史贡献可从社会作用和学术价值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从其社会作用看,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史学对于中华民族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有其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

首先,它唤醒了广大国民的民族意识。中国先民开疆拓土的

① 参见田亮:《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参见尹达:《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中国文化》第1卷第5期;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

③ 参见吴泽:《中国人种文化起源论》原载于《民生史观研究文集》,重庆中山文化教育馆1943年版。

④ 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1941年。

⑤ 参见田亮:《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文治武功,辉煌悠久的历史,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反抗异族征服的民族英雄事迹,舍生取义、高风亮节的志士仁人,创造发展灿烂文化的杰出人物,无不通过史家的生花妙笔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生为中国人的光荣与自豪;而世界亡国之惨状,中国近世以来积弱积贫、屡遭东西方列强欺凌的沉痛历史,又一再激发起他们生为中国人的忧愤和责任。

其次,它激发了国民的爱国热忱。中国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以及从不屈从于外来压迫的文化传统,又使国人在任何艰险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充分的民族自信,坚信中国不可亡,中华民族必将焕发出青春和活力去战胜一切侵略之敌。抗战史学对帝国主义侵略理论的批判,对汉奸投降理论的驳斥,对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进步必然战胜反动这个历史规律的揭示,使国人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学无论就当时还是在今天看来,都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就。林甘泉在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成就时指出:“抗战期间,转移到大后方的史学家颠沛流离,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身处沦陷区的史学家,大多数坚贞不屈,保全了民族气节。战争是一场灾难,但它也最能锻炼人。正是在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无论是实证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有很大进展,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①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对于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动员千百万人民群众献身于抗战救国大业,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而它对我们民族精神的铸造,对陈陈相因的污浊积习的涤荡,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如吕振羽、吴泽、华岗等对日本学者秋泽修二法西斯侵略史观的有力批判;翦伯赞

①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的古代史研究和著述,集中地反映了他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主张革新政治、反对复古倒退的爱国主义思想;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用许多笔墨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肯定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触动了国民党当局的痛处。戴逸说:“这样一部书,一旦产生出来,必然成为革命者的锐利的思想武器。我第一次阅读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简编》,是在北大历史系读书的时候,是一个青年学生,当时也看过一些历史书。但这部历史书与众不同,与以前看的都不一样,观点新颖,气势磅礴,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指点江山,评论千古,给人一种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感觉,给人以极大的震动。”^①刘大年也说范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了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新中国研究近代历史的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培养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拿我自己说,1942年我第一次读到《中国通史简编》,那时在冀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场上。”^②

在延安,史学家们尽可能采取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诸如:用平话来编写简明历史读本,用传奇来编撰历史人物传记;在内容上,或采之于古代抵御异族侵入的民族英雄抗敌故事,或取材于当代抗日故事,范围广泛,材料丰富。其代表作有许立群的《中国史话》、尹启民的《中国历史讲座》、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曹伯韩的《中国近代史常识》和《中国近百年史十讲》、敬之的《中国历史》等等。^③这些在今天看来不足道小册子却是当时抗日军民宝贵的精神食粮,仅在抗战期间就多次再版,总印数以百万

① 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 刘大年:《光大范文澜的科学业绩》,《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参见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第九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计,受益读者遍布根据地及大后方各地,它们在激励无数华夏儿女在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殊死搏斗的过程起到了巨大作用。

和范著齐名的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据朱政惠先生调查,香港生活书店、香港三明书店、东北新华书店、华东新华书店、香港书店新中国分店、东北书店安东分店等,都出版和印刷过这本著作。而据吕振羽在该书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后记可知,仅从1948年到1959年的12年间,该书就印行了40万册左右。^①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一时期高歌猛进相表里,新考据派史学和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继续取得可观的成绩。陈垣先后撰写了论文《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专著《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清初僧诤记》和《通鉴胡注表微》等,不仅是在有意识地提倡民族气节,弘扬爱国精神,而且在学术上都取得了巨大成绩,都是足以流传后世的学术名著。^②陈寅恪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期间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许多论文,旨在阐发保存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家更通过历史教育来激励民族精神。吕思勉在上海孤岛期间完成的《吕著中国通史》,也是当今历史系学生的必读书。在书中,他非常乐观地说:“岂有数万万的大族,数千年的大国、古国,而没有前途之理?”“难道我为奴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隶,今生便了。”^③字里行间洋溢者中国人民必将战胜强敌、中华民族必将复兴的自信和乐观,这种乐观根植于对中国历史

① 参见朱政惠:《论吕振羽史学》,《史之心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

② 参见田亮:《试论抗战时期陈垣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③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6—497页。

的深切体认,根植于对民族文化的无比热爱,读来令人振奋。

缪凤林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纲要》,“旨在就古今民族文化政治社会各种变迁之荦荦大者,略述其经过与趋向”。^①该书在当时拥有众多的读者,取得的广泛的影响。^②钱穆完成了洋洋30万字的《国史大纲》的写作。有论者称该书:“寓涵民族意识特为强烈,复在重庆等地作多次讲演,一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黄宇讲坛一学人,为书生报国立一典范。”^③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学术报国的光辉典范,是“士人”主动参与现实、推动社会前进的少见的成功范例。特别是抗战时期的爱国史家的史论、史著在鼓舞民气方面的重要作用,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分。

正如戴逸所指出的:“到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历史学家们怀着爱国救亡的思想与激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记述与研究。他们歌颂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赞美那些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鞭挞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为鼓舞人民投身于反帝斗争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④

三 抗战史学的分野及阶段性演变

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场殊死较

① 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页。

② 参见田亮:《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④ 马宝珠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光明日报》1998年1月20日。

量。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各派政治势力暂时捐弃前嫌,同仇敌忾,建立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史学界而言,同样有一条时隐时现的主线贯穿抗战全过程。抗战史学可以根据其有无民主主义内容以及民主主义主张的彻底性与否,依次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民主主义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三个层次。

民族主义史学又可分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和政治民族主义史学。前者强调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认同的基础,主张通过历史教育培育国民的爱国心,在历史观上主张通过光大民族传统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后者则强调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把“国权”和“民权”割裂甚至截然对立起来。在史学思想上,民族主义史学或者在文化上与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文化观纠缠在一起,容易滑向复古守旧一派;或者在政治上与极权统治相表里。^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对于树立国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对于消除内争、调动各种力量抵御外侮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民族危机缓和以后,它在阻碍社会进步方面的消极影响就变得日益凸显。

民主主义史学首先认同于政治民族主义,即强调民族尊严,主张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它反对专制政治,主张人民民主,希望用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模式来改造中国、富强中国。它的致命缺陷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找不到变革社会的基本力量,希望获得人民的支持,但又害怕发动起来的人民起来革命。因此,它的民主主义是不彻底的,因此它的爱国主义也是不彻底的。在史学思想上,这派史学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它一方面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又怀疑甚至抵制人民革命。

^① 参见田亮:《战国策派民族主义史学在抗战期间的兴衰》,《河北学刊》2003年第3期。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把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机结合的典范,是抗战时期最高层次的爱国主义史学。在历史观上,它力图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来分析历史现象并给以合理的解释;它用全球视野观察问题,抱有进步必然战胜落后、正义必然战胜邪恶的乐观,并以此来预示中华民族必然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必然失败的前景;它把抗击外来侵略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把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史学方法上,它主张博采众长,综合运用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在政治上,它主张用彻底的社会革命方式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

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不仅有层次之分,而且有阶段之别。由于爱国主义的历史性,它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转换其主题,因此,各层次爱国史学在各个阶段能在多大程度上契合爱国主义主题,自然成为判断爱国主义的彻底性与否乃至真假爱国主义的基本准则。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爱国主义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换着它的主题,而唯一不变的是它始终指向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其发展进程来看,大体上可分为敌人进攻我方防御、敌我相持以及我方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抗战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不同的。在第一阶段,深沉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使中日民族矛盾压倒了一切,此时,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投身于抗战救亡事业。到第二阶段,由于敌我战线的延伸,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已经无力发动像战争初期那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于是一方面对重庆国民政府采取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另一方面则逐渐加大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进攻。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顽固派则不断挑起反共摩擦。因此为了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必须与各种破坏抗战的言

行作坚决的斗争,但斗争的目的是维护团结,一致抗日,是为了顾全抗战大局。在这一阶段,对外反侵略的爱国主义与对内争取民主的政治诉求相呼应,其主题应是包含民主主义追求的民族主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日战争进入第三阶段。这时候,国民党统治集团“苦撑待变”,对日作战更加消极,而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不断壮大的担忧强于亡于日本的恐惧,因而其将重点精力投入反共活动。与此同时,围绕抗战胜利后的建国问题,国内各种势力展开了日趋激烈的角逐:是维持国民党一党独裁,还是建立各党派广泛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因此,在这一阶段,爱国主义的主题就是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新民主主义。

爱国主义主题的转换决定了爱国主义史学的主题转换。在第一阶段,爱国主义史学表现为演绎历代英雄人物传记,发扬不畏强暴、崇尚气节,反对投降的民族精神;表现为铺叙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从而培育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表现为研究祖国边疆历史、民族和地理,来激发国人爱国保土的使命感;表现为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警醒国人莫忘国耻,奋发图强;表现为研究各民族反侵略史,为国人抗战事业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表现为批判帝国主义种种侵华谬论,坚定国人抗敌信心;表现为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昭示中华民族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前景……总之,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的澎湃以这一阶段的史学最为典型,最为丰富多彩。

在第二阶段,爱国主义史学表现为通过历史事实,揭示主张抗战反对妥协的时代主题;表现为昭示内乱和外患的因果联系,说明团结对抗战的重要意义;表现为通过对历史上民族战争期间傀儡政权可悲可怜命运的揭示,警告公开的和隐藏的投降汉奸分子,对敌人妥协决没有好下场;表现为通过历代强弱盛衰经验教训的总结,揭示政治的清浊、民心的向背与国力强弱、民族盛衰的相互关

系……也就是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是本阶段爱国主义史学所要反映的思想主题，同时，民主诉求逐渐成为爱国主义史学的主旋律。

到第三个阶段，爱国主义史学的主题再度转换，主要表现为通过史学来证明民主共治必然取代专制独裁，进步力量必然战胜反动势力的历史规律；表现为批判英雄史观，主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高扬“人民本位”价值观；表现为批判固守传统的复古主义，提倡兼收并蓄、开放趋新的文化价值观；表现为反对崇洋媚外的民族虚无主义，倡导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一言以蔽之，“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乃是这一阶段爱国主义史学的主旋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所代表的先进文化将逐渐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必须指出，三个阶段的史学并不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的划分只有相对的意义，比如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界限就不明显。笔者做这样的划分仅仅在于说明，随着反侵略战争的进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反映时代精神的爱国主义主题也在不断转换着，并且在史学上有所反映。但无论是哪个流派，也不管在哪个阶段，民族主义都给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和著述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四 关于抗战史学局限性的若干思考

抗战史学对唤起民族精神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但是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缺陷。

其一、客观上，研究条件的限制所造成的学术成果质量缺陷。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和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熊熊的战火烧毁了思想文化界的温梦，他们已经不可能相对平心静气地从事系统、深入、细致、精微的学术研究，时代要求一切思想文化都服从

与那场你死我活的民族决战,以及相应的战时政治、战时经济、战时生活”。^①由于抗战,不少史家辗转各地,颠沛流离,不仅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学术研究更是困难重重,资料获取困难。如范文澜“在延安写书时的条件很差,不仅买不到必要的参考书,而且外借也很困难”^②,甚至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到。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等著作“大部分是在窑洞中,马背上逐步写成的”。^③这样,在客观上,抗战史学的学术质量不能不受到影响。吴泽先生曾说:“战乱期间,转辗平、津、京、武汉、成、渝诸地,奔波于兵荒马乱之中,在渝寓处,就两次被日机炸毁,烧成瓦砾,资料文稿也几次损毁。”“颠沛流离,不能安居,何暇写著!尤其是资料的搜集感到万分的困难。”^④可想而知,在那样艰苦而简陋的条件下,要完成精致的学术著作,对战时的史学家们,实在是心有余而“书”不足!

其二、主观上,治史目的的偏颇所造成的研究结论与历史真实的距离。

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动,政治变革始终是全社会最为瞩目的中心任务。这种现实,使中国史学的政治学功能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显得更加突出:其时,“中国现代史学既继承了清末以来进步知识分子的时代忧患感,又有革命年代经历了一系列学术思想重大论战和血与火的社会政治实践的洗礼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

①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

② 丁名楠:《怀念范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③ 曹健民:《何干之传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7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页。

④ 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序,棠棣出版社1949年版。

史学斗争传统,故其经世意识尤为强烈”。^①抗战时期,各派史家都或多或少地强化了经世意识,为抗战而研究历史、著述历史成为众多史家共同的思想倾向。但是,在强调经世致用,实现了史学的社会价值的同时,致用倾向也使学术本身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顾颉刚曾说,抗日战争把中国的学术工作拖后了20年。^②原有的研究计划被打断了,或者被放弃了,而“求真”的旨趣也一度被冲淡了。在他们的论著中也出现了一些“粗率浅薄”之作,典型的例子是傅斯年主编的《东北史纲》,有的学者批评“其缺漏纰缪,始实破任何出版史籍之记录也”。^③

这种现象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向抱着“为改变历史而研究历史”的治史宗旨,强调史学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吕振羽不止一次地说过笔剑并用、史学致用的问题。他强调,史家不应单纯地为认识过去而认识过去,史家所从事的历史科学应是人类生活斗争的指南针,应对人类实践的路线、方向、目标“尽着正确的指导的作用”。^④吴玉章认为,在全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今天,“为了激发同胞的爱国精神”,“唤起各阶层团结一致,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救亡图存”,就不能不发扬民族固有的“爱国思想”,就不能不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⑤因此,“我们要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须要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如像岳武穆底‘直捣黄龙’,戚继光荡平

① 参见胡逢祥:《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② 顾颉刚:《〈史苑〉周刊发刊词》,(沪)《益世报·史苑》1946年9月20日。

③ 缪凤林:《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首》,《中央大学文艺丛刊》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

④ 吕振羽:《谈史学——致青年同学》,《学生杂志》1940年第20卷第6期。

⑤ 吴玉章:《中国历史教程》“绪论”,新华书店1949年再版,第5页。

倭寇,我们一读到他们的史传,则不能不激起无限爱国的忠诚。因此我们相信,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常常是从历史中动人的事迹得来。”他还说:“在这个很需要发扬爱国热忱,继承革命传统的时候,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有特别重大的意义。”^①

然而,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在于培养人的爱国心,其研究内容也不能仅仅限于爱国与否的范围。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人类的现实与未来发展提供科学的指南。即便是史学知识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乃至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也只能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否则,一味以爱国作为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势必模糊对史学研究真正任务的认识,并有可能损害史学的科学认知功能。因此,抱着为抗战救亡的宗旨而研究历史时,就不免强古就今、以古证今现象的发生,尤其是为激发人民爱国、革命的义愤,不惜借古人古事所今人今事,任意作历史类比,把历史现实化。例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就存在着这种“简单地借古人古事类比今人今事”的现象。“本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②

翦伯赞在《桃花扇底看南朝》、《论西晋的豪门政治》等文章同样是借古寓今之作。翦伯赞也在建国后做了自我批评:“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寓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寓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特别是今天的现实与历史上的现实已经起了本质上的变革,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起

① 吴玉章:《序言》,许立群编著:《中国史话》,上海野草出版社1946年再版。

②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第4卷第2期,1951年。

来,那不是把历史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①

瞿林东指出:“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但史学对社会的关注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关注现实“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是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②

可喜的是,到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已经开始反思前一阶段片面强调致用的倾向,他们在继续强调“致用”的前提下,逐渐突出了“求真”的内容。郭沫若指出,研究历史就要“以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历史真相,不能“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③无独有偶。华岗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中国历史的翻案》一书中指出:“为着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但我们所需要的过去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④即使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为了鼓舞和推动广大民众参加解放斗争”而“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错误,而且不能容许的。”因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必须实事求是,不能容许人们说谎行骗。假如认为为了‘垂训’与‘教育’的目的,可以歪曲历史事实,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事实或增减事实,那就是离

①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9月号。

② 马宝珠等:《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光明日报》1998年1月20日。

③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1页。

④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作家书屋1946年版,第3页。

开了科学的立场,否定了客观真理,而一切离开科学立场与否定客观真理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有害和错误的道路”。^①对那种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用“以今喻古”的机械类比把古人现代化的做法,华岗指出,这种“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的办法,同样有歪曲历史真实的危险”。^②可见,在民族危机缓和以后,作为抗战史学典型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纷纷开始反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非科学做法,恰恰说明抗战史学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但终究是瑕不掩瑜,总体上看,作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史学毕竟在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方面,不仅对当时的救国大业贡献良多,更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可以相信:他们的著述如同未探明储量的巨大矿藏,将不断成为后人研究中国史学乃至中国文化时不可不重点开发的宝贵资源;而无数爱国的史学家们虽然不能像战士那样征战沙场,但他们着笔于往古,立足于当今,以笔代剑,履行了他们的神圣天职;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有这样或那样的缺失,但作为大写的中国人,他们终究无愧于那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他们的光辉业绩将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作者田亮,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①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第5页。

②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第27页。